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五十三期 二零零七年三月八日

编者的话：本期发出两篇文字，一篇是克伦斯基访谈录，一篇是《托洛斯基自传》中有关十月革命的部分。在那一动乱时期，前者是冬宫临时的主人（一个转瞬即逝的幽灵），后者则占据了斯莫尔尼宫，这两座宫殿都是罗曼诺夫家族的祖业，没有什么能比这一情形更生动地反映事情的要旨：争夺沙皇巨大的遗产。

在总结“十月革命”时，革命领袖托洛茨基写道：“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是无意识历史过程的自觉表现，但无意识——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过程只有在在其最高峰上，即群众的自发反抗打破了社会陈规陋习的大门，使历史发展的深层要求胜利地表现出来时，才能与其自觉的表现合拍。此时，时代最高的理论意识和其最深远的根源——根本不懂理论的群众的直接行动融为一体。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结合，就是那通常被称为灵感的东西，革命是历史最强的灵感”。

他的意思是说，领袖是无意识的历史的有意识的工具，群众则是历史和有意识的领袖的无意识的工具。且不说这种表述有多么别扭，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即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是“自为的阶级”，是被理论“掌握了”的群众，而不是什么“无意识的”、“根本不懂理论”的群盲。尽管说得云山雾罩，但至少透露了“十月革命”的一个真相：群众根本就不知道布尔什维克的真实目的，只知道它所许诺的“面包、土地、和平”，却不知道它内部的口号：“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结果人们得到的是连年的战乱和饥饿，土地也被剥夺。

如果换一种说法，比如说革命领袖为达到其掌权的目的，以历史的名义利用了不明真相的群众……一旦剥离了“历史/哲学”的赘物，事情就一目了然了。

这段文字透露出的另一个真相是，直到事变迫在眉睫，革命的领导者对政权的到手还没有准备，他们“勉强赶上了汹涌的潮流”，而列宁还沉浸在马克思的戒条之中，以为革命应首先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这可不是小的偏差，这一偏差足以动摇理论的根基。但不是他们，而是历史的进程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这段话之所以如此别扭，是因为他想把实际发生的情况与理论规条凑合在一起。

当托洛斯基被事变之潮裹挟，在斯莫尔尼宫梦游般“指挥”“起义”，而政权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心里不禁纳闷：这事情……怎么就成了呢？托洛斯基无法解释这一切，便归结为“灵感”、“深刻的本能”、“从其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嗅觉”……这位无神论者已经有点像巫师了，而“十月革命”也变得像一出希腊戏剧：在尘世的命运和事件之上，冥冥中有神明操纵，这个神明就叫“历史的辩证法”。

许多年后，另一位当事人克伦斯基对那段令他痛心的岁月发表了看法。他并不想把他的失败归因于超验的历史必然性（托洛斯基称他为“偶然人物”，以区别自己这种“必然人物”），他所列举的，都是当时现实中的因素——战争，苦难，人们的不满，德国的阴谋，布尔什维克的煽惑，加之临时政府和他本人的失误，这一切凑在一起，导致了他的失败。他没意识到，他最大的失误是罔顾百姓的苦

难与和平的愿望。但话说回来，即使他愿意如此，他能够控制布尔什维克掌握的大众吗？再说，有尼古拉二世的前车之鉴，他也不敢退出战争。

令克伦斯基耿耿于怀的是，当同盟国对俄罗斯的内外交困袖手旁观的时候，德国却在大力支持和资助列宁。列宁究竟是不是受德国总参谋部资助的“德国间谍”？他在关键时刻被德国人放回，他对前线军队的破坏和瓦解，他一经掌权便宣布停战，接受苛刻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种种迹象叫人不由得这么想。对克伦斯基的此项指控，托洛斯基在自传中做了激烈的辩护。但鉴于鲁登道夫（一战时德国军队总参谋长）战时回忆录的发表，他承认在德国总参谋部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存在着“互相利用”的情况。

现在看来，作为当局者，克伦斯基论及自己的失败的时候，忽略了背景性的因素：临时政府所代表的俄国中产阶级还不强大，没有做好接管权力的准备。比如托洛斯基就发现：民主派的身后竟没有军队！的确，从书斋和沙龙走向议会的民主派知识份子们，除了观念，两手空空，即没有克伦威尔的护国军，也没有巴黎的国民卫队。

其实命运早就注定了。一九零四年，在中国的领土和日本海上，新兴的现代国家日本与处于中古时代的俄罗斯进行了对决，不止是武器的对决，而且是制度的对决，古老的君主专制败给了现代的君宪专制。俄罗斯国内的争论终于在战场上有了答案，沙皇制度的信誉彻底破产。战争引起了革命。一九零五年革命爆发，其后，亡羊补牢的改革被迫有限的进行，但沙皇仍旧想用暴力维持落后的专制制度……这场矛盾而痛苦的改革尚无结果，一场空前的战争又一次引起了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沙皇退位，毫无准备的俄罗斯陷入了混乱，仓促上阵的临时政府进退失据，军队被牵制在遥远的前线，整个国家无人值守。这就是布尔什维克“起义”时面临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段时间，布尔什维克利用他们斥之为虚伪的民主程序取得了苏维埃的控制，并最终将这一制度改造为专政工具。这与十多年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选举夺权的方式如出一辙。

事实真相是，没有什么“决战”，只有一场单方面的密谋在彼得堡人的睡梦中进行，红色潜流在夜晚空荡荡的街道上肆虐，而罗曼诺夫王朝的宫殿犹如巨大的尸体，静静地躺在那里，任由攫取和摆布……

若干年后，托洛茨基乘“伊里奇”号（像是命运的讽刺）亡命海外；又过了若干年，命运绕了半个地球追上他，一把现实的冰镐砸进了他的意识形态的脑袋，却没能把他砸醒，他带着破裂的花岗岩脑袋去见了马克思。

另一位当事人克伦斯基逃过了尚未形成的铁幕，在大洋彼岸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虽郁郁而终，却也得享天年。他漫长的一生亲身经历和从旁目睹了两次大的“战争引起革命”，第一次是他的祖国，第二次是半个欧洲和中国。耐人寻味的是，每次都与德日这两个国家有关，而且不要忘了，德国不但是战争的策源地，也是革命理论的策源地。

“十月革命”七十年后，历史再度重演，仍旧是痛苦的解体，罗曼诺夫的双头鹰换下了布尔什维克的镰刀斧头，三色旗再度飘扬在东正教的土地上。

黑格尔写道，历史给人的教训就是：历史没有给人任何教训。这就是历史一再重演的辩证法，也是这位思辨家留给后人的最深刻的教训。

注：本期两篇文章皆历史事件当事人的陈述，不代表编者观点。

克伦斯基谈“十月革命”

罗仁

苏联及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将于今年十一月七日热烈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在今天仍活着的人之中，只有两个人真正有资格评论十月革命之究竟是否“伟大”。因为在俄国大革命时期位居要津而能熟知布尔什维克革命真相的人之中，只有这两人仍在世。一个是当年布尔什维克夺权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莫洛托夫，但他现正遭到后辈的同志们软禁，不让他有发言机会。另一个是当年遭列宁夺权的俄国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目前流亡在美国，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本刊华府特约通讯员罗仁为探究十月革命的真相，特走访克伦斯基氏，以下是罗君报导的全文及访问克氏的实录。

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沙皇政权土崩瓦解，全俄国几乎没有一人感到惋惜，而所有的人都欢欣鼓舞。“二月革命”被史家称为有史以来最受民众拥戴的革命。

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是个律师，代表一个实力薄弱的非马克思主义工会组织参加了临时政府，由于博学多才而头角崭露，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临时政府的领导人。他主张在俄国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及继续对德国作战。但布尔什维克党人却在背后向他频施冷箭。

“二月革命”是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奇特环境下发生的。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酣，前线俄军败讯频传，俄国的贵族及军事领袖们怀疑沙皇尼古拉二世企图与德国片面媾和，因此密谋发动宫廷政变来夺取权力，以避免缔立屈辱的和约。而沙皇本人也已惊觉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他在首都彼得格勒（现列宁格勒）地区对反战示威及罢工者施以残酷镇压。

通货膨胀、粮食缺乏、以及在前线得不到丝毫进展，已在工人和士兵中形成一种普遍的反叛情绪。示威运动四起，而警察公然抗命拒绝镇压示威，事实上在示威行列中还有许多军警及水兵参加。在短短几星期内，反叛行动如野火般蔓延全国，最后连沙皇的近卫军也叛变了。沙皇在一批高级将领的劝告与压力并施下，终于宣告逊位。

稍早之前被沙皇解散的俄国议会，仍不断秘密集会。当沙皇逊位后，议会再度公开活动，并选出了一个临时政府来领导全国。

克伦斯基下令在六月间对德军发动全线攻击，但六月攻势遭德军击溃，军方归咎于临时政府的软弱无能及领导无方，并密谋要推翻这个政府。同时，在列宁和托洛斯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全面向军队渗透，并且组织了工人与士兵的联合行动委员会，即所谓“苏维埃”（名义上也包括农民，但事实上农民参加此一委员会者绝无仅有）。“苏维埃”的势力渐趋庞大，而拒绝参加临时政府。

列宁公然主张立即对德缔和，解散军队，土地分给农民，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

布尔什维克的停战主张深得民心，使克伦斯基政府极感棘手，但这还不是克氏所遭遇的仅有困难。因为在另一方面，千千万万农民都在等待着分配土地，而临时政府鉴于秋收在即，为了避免妨害农业收成而暂缓分配土地，主张在过了年之后在有条不紊的情况下，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同样的原因使选举制宪议会的全民投票也告押后，因为在选举制宪议会之前必须先举行地方选举，而临时政府深恐在当时的环境下举行地方选举必然会在各地引起混乱。而布尔什维克却以此为借口，指责临时政府不履行诺言，因此骚动日趋蔓延。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布尔什维克以武力占领彼得格勒，克伦斯基政府面临了末日。克伦斯基犹图为维护民主政体而作最后挣扎，他下令北方前线的俄军回师彼得格勒，但前线司令皆按兵不动，驻守彼得格勒的哥萨克骑兵也袖手旁观。原因是军方将领们已决定牺牲克伦斯基来讨好布尔什维克，他们认为听任那些没有学识和经验的“苏维埃”人员去执政，必然会

造成大混乱，而大混乱的结果将可使拥兵自重的军方将领们成为政权角逐战的最后胜利者。这就是十月革命得以获致“伟大胜利”的关键所在。这些心怀叵测的将领没有料到布尔什维克在执政后立即全力扩展红军，并在德国的支助下把各将领的部队各个击破，根本没有机会让他们角逐政权。

列宁以这种偶然的机运而执掌了政权。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得以成功完全是拜一连串阴差阳错之赐，而竟真以为自己所主张的暴力政治及无产阶级专政比民主政治为强。因此当他掌握政权后，从来不重视民意，而完全诉诸于极权恐怖统治。

克伦斯基所领导的革命并非历史的偶然事件，而是俄国人民长期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之实现，但在战争条件下，他所提倡的自由和民主无法立见功效。临时政府的优点既无法为民众所了解，而战争造成的物质条件之困难却为民众所见，再加上军方将领们的存心不轨及布尔什维克的从中捣乱，终于使俄国历史上仅有的这个民主政府只存在了八个月。

以下是记者向克伦斯基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克氏的答复。

记者问：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是谁组织的？

克氏答：根本没有任何人筹划或组织这场革命，而完全是自发的。当时俄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连遭败绩，俄国与英法两盟国的处境完全不同，英法两国可以远隔重洋从加拿大、美国、南非联邦、印度、澳洲、新西兰等地获得粮食和军火支援，大英帝国属下的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南非、印度等殖民地还皆出兵助战，而俄国则什么支援也没有，我们完全处于封锁状态中。彼得格勒的饥民首先发生暴动，大骚动迅速蔓延全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于俄历二月宣告逊位。

问：于是就立即成立了临时政府吗？

答：是的。这是一个温和的政府，有意建立君主立宪制，仍保持王位，但必须有一个比较开明的人担任国王。尼古拉二世实在要不得，他甚至对“立宪”一词也深恶痛绝，他生平的最高理想是要使俄国回到十七世纪的专制极权统治。

问：你的意思是否认为沙俄政权的末期已比十七世纪时有了许多进步？

答：当然罗，这中间经过了两段重要时期。

第一个阶段是十九世纪中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期，这是产生了像托尔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以及其他俄国大作家的时代，同时也是开始建立铁道及在经济上全面发展的时代。

第二个阶段是从一八九五年开始，维蒂伯爵——他当时还没有封伯爵——用现代化的方法发展工业，并且全力支持在农业和科学方面的一切进展。

政治观念在这两个阶段中也有了长足进展。把沙俄视为一个在工业上非常落后的国家，是无知之见。一九一四年开始的世界大战，虽然影响到俄国的整个经济体系，并且使各大工业区之间的运输力量遭削弱，但当时的俄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已经是一个工业先进国家。

问：这样说来，俄国的工业化发展并不是从共产党执政之后才开始的？

答：当然不是。

问：布尔什维克的头子们如列宁、斯大林和托洛斯基是否参加了“二月革命”？

答：没有。列宁当时在瑞士，托洛斯基在纽约，斯大林在西伯利亚。他们皆对“二月革命”毫无贡献。我在临时政府成立的一天起就参加政府工作，先是担任司法部长，后来担任国防部长，一九一七年七月起出任总理。

问：是不是在你扑灭了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次夺权阴谋后才出任总理的？

答：是的，在“二月革命”成功后，列宁仓促赶回国内组织这项阴谋，但立即被粉碎。事实上，列宁此举反而使临时政府更为巩固而稳定。

问：你的政府是否准备继续对德作战？

答：当然。大战一开始我就不断呼吁国人与盟国联合一致对抗共同敌人。战争开始时我是国会议员。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我在议会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呼吁我军将士“保卫俄国，作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求取俄国自由。”

问：你的政府是否曾获得美国或欧洲盟国的大量援助？

答：我已经说过，俄国受到严密封锁。美国的威尔逊总统由于国内政治原因，无法像他对欧洲盟国的支持一样给俄国大量援助，我的政府没有得到过美国政府的任何金钱、物质或军火援助。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我们曾获得一些美国私人企业的援助，但所有援助物资皆取道英国运来，我的政府为了取得这些援助品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给斯大林以大量援助，如果我的政府当年能获得后来美国给斯大林的援助之中的十分之一，则我的政府就能支撑下去，历史的发展将完全改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也根本不会爆发。

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十月革命”爆发前夕，仍有可能阻止布尔什维克推翻你的政府？

答：当时只要有办法截断列宁从德国手中获取的援助及大量金钱，就有可能制止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爆发。

列宁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从瑞士取道德国返回俄境。在同年七月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次夺权行动失败后，他转入地下，先是躲藏在彼得格勒，后来在彼得格勒无法立足，逃到与芬兰边界相距不远的一个小村，最后逃入芬兰境内。

到九月下旬，他抵达在俄国边界附近的芬兰维堡市。十月初，他化装潜回彼得格勒，并向布尔什维克党人发出了夺权号召。

问：列宁的活动是否一向受德国支持的？

答：列宁与柏林参谋本部之间的关系开始于一九一五年底。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外交部的机密档案中有详细记载。这批档案资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落入英国政府手中。

列宁与德国参谋本部的间谍招募组织之间的勾搭过程，非常曲折离奇。负责与列宁打交道的德国谍报机关的大间谍自称巴伏斯，而他的真名则是希尔芬博士，他全力支持列宁，而且也是列宁一切活动的幕后扯线人。

巴伏斯与当时的德国驻丹麦大使兰佐伯爵合作拟具了一项分化俄国的计划，这项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支持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国内的一股强大势力，因为布尔什维克主张把德俄之间的“帝国主义国际战争”变为俄国内部的“阶级战争”。

问：许多人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俄国人民为列宁所承诺的“停战”计划所吸引。你认为这说法对不对？

答：列宁绝对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他不赞成国际间的互相杀戮，而主张每一个国家的人民进行自相残杀，这叫做阶级斗争。

列宁在瑞士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认为阶级战争不会在俄国发生，因为他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太年轻也太软弱，无法组织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而“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将在德国、英国及美国等工业大国内组织起来”。列宁写这些话，并不是表示他不忍心看俄国人民的自相残杀，而是认为俄国人民还不够自相残杀资格，他认为在美英德等国可以先进行自相残杀然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在俄国则须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才大刀阔斧地自相残杀一番。因此他的所谓“停战”，只是停止对外战争，而是对内战争的开始。

问：列宁究竟从德国人手中得到些什么样的支援？

答：列宁从德国人手中接获专为推翻俄国民主政府而用的四千万金马克。另外，德方又为巩固列宁在莫斯科建立的政府而供给他四千万金马克。即总共从德国人手中获得了八千万金马克。

问：这些钱是否皆是偷运进俄国境内的？

答：不错。当时要把钱转入俄国是毫不困难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可以迳向银行领取款项。这笔钱之中的大部份，是由德方存入斯德哥尔摩的一家瑞典银行，然后汇到俄国的西伯利亚银行，该行在全俄各地设有分行。

问：你怎会知道这些事情的？

答：我完全不知道。这是德国的国家机密。

直到一九一七年七月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次暴动失败后，我们才知道列宁是个卖国贼及这次暴动的组织者。这次暴动在时间上是完全配合着德军在前线的反攻而进行的。

列宁在暴动失败后逃之夭夭，我们对他在彼得格勒的住所作了搜查，这座屋子是属于已退休的芭蕾舞明星许辛丝卡雅的，而被布尔什维克据为总部。我们搜获了有关列宁活动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文件，包括他与西伯利亚银行的银钱往来关系、及布尔什维克暴动的组织计划。

问：列宁是否曾利用这笔钱来进行反对你的政府的宣传活动？

答：对的，布尔什维克印发的宣传品大多针对着我。他们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克伦斯基准备出卖“二月革命”的一切民主成果，以挽救俄国的大资产阶级政权。布尔什维克对我恨到入骨。

问：你刚才曾说，假如你的政府得以生存，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你有何根据而作此论断？

答：首要原因是因为第二次大战是由于原有的均势遭破坏所致。其次是因为在缔结凡尔赛和约之后，欧洲再度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集团。

如果俄国是一个民主而强盛的国家，则欧洲的实力均势不会改变，而希特勒也就没有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条件。

问：当时的俄国民主政府是否真已无可挽救，抑或仍有挽救余地而你没有尽力为之？你在事后是否发觉曾铸下了一些可以引为未来殷鉴的错误？

答：五十年来，我对这个问题曾经反复思考过许多次。我发觉在处理柯尔尼洛夫“叛变”案中铸下了大错。柯尔尼洛夫事件也许是我的政府的致命伤。

问：柯尔尼洛夫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答：拉维尔·柯尔尼洛夫将军在许多俄国人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民族英雄。他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由我任命为俄军最高统帅。

当时有许多人怀疑柯尔尼洛夫将军可能发动一次反革命行动来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府。他调遣了一支骑兵队到彼得格勒，引起了临时政府中的许多人疑神疑鬼，以为军事政变已迫在眉睫。于是我罢免了柯尔尼洛夫的最高统帅之职，并在阿里西耶夫将军的坚持下，由我兼任俄军最高统帅。

克里莫夫将军率领下的哥萨克骑兵队，于柯尔尼洛夫事件发生的第一夜向彼得格勒推进，但在首都附近的卢加被挡住。柯尔尼洛夫毫无抗拒地交出兵权，并与另外几名涉嫌参与反革命政变的军官一起锒铛入狱。

柯尔尼洛夫事件对士兵们、彼得格勒的工人以及各社会党的领袖们造成了重大的心理影响，他们对临时政府的信心降低了，因而使政府的地位更为削弱。

问：柯尔尼洛夫后来怎样？

答：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的第一天，他从彼得格勒监狱中逃出。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柯尔尼洛夫将军领导了一支白卫军在俄国南部地区继续对红军作战。一九一八年四月，红军发射的一枚炮弹直接命中他的指挥所，当场身死。

问：你在临时政府被推翻后的处境怎样？

答：我在事发后的初期，在俄国转入地下，后来逃到国外。

问：克伦斯基先生，经过了这么多年，你现在对俄国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你认为它是

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答：失败了！马克思对人类前途所作的一切预测，在五十年来的实践中证明与事实恰好相反。例如马克思预测资本主义世界的财富将日渐集中于愈来愈少的几个大资本家的手中，中产阶级最后终将被消灭而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使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经济地位大为改善，政治地位也相应提高，并不是中产阶级沦落为无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发展为中产阶级。只有在所谓共产主义的国家中，才出现了像当年马克思所“预料”的应该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情况，即中产阶级被消灭而并入无产阶级。

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是由反共书报或宣传所造成，而是共产主义本身所造成。这种情况现在正在苏联开始发生。

问：但苏联自称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已获得了非凡重大的成就，例如在太空发展及工业等方面皆的确有所建树，这又应该如何解释呢？

答：苏联的科技发展开始于斯大林时代，皆是与战争工业有关的，其目的是要把苏联建立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据点，作为夺取全世界政权的基地。但在科学和技术上达成的这种成就，对俄国及其人民又有什么好处呢？共产党沾沾自喜而大肆吹嘘的一点成就，都是在俄国人民受到巨大牺牲和摧残的情况下达成的。你只要想一想千千万万投入奴工营和在整肃中遭残杀的人，然后再看一看共产党所渲染的成就，你就会明白这些成就是否值得崇敬。

问：你是否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已临日暮途穷之境？

答：一点不错。不仅在俄国是如此，而且在其他东欧国家如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等也都是如此。

年青一代的共产党人，对于为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而牺牲自己人民的利益，已丝毫不感兴趣。甚至像我这样的人，在和年青一代的共产党人交谈时，有时也能谈得很投机。例如有一次我问一名到美国访问的苏联共青团员：“你的主要目标是否达成世界革命？”

他听了哈哈大笑，并说：“管它什么世界革命不世界革命，在非洲或者随便什么地方建立共产政权，对我们毫无关系。我们的希望是使自己的人民生活过得稍微好一点，有更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我们自己。”

你看，经过了漫长的五十年，共党政权仍无法保证给人民以足够的面包。直到今天，在俄国仍有许多人得不到足够的面包，也没有第二条裤子。他们已经明白，共产主义不能成为一种现实的统治基础，尤其是在发生战争时更为明显。

克里姆林宫的老爷们想来还没有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联的窘境。因此现在柯西金正在努力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准备万一在遭到中共或美国的攻击时，能使人民对政府表现较大的忠诚。

问：那么你是不是和毛泽东有同样的看法，认为今天在柯西金领导下的苏联已经脱离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答：今天克里姆林宫所走的路线，当然不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最明显的例证是在工业方面的转变，克里姆林宫当局命令所有工厂必须根据人民的需求而进行生产。这种方针在苏联是从未有过的。

问：苏联与中共的势成水火，是否也是马克思主义失败的又一例证呢？

答：是的。我认为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是表现在它已停止进步及停止经济上的发展，而是表现在共产主义的信条已经停止产生效率。事实上，这种信条所产生的根本不是什么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而只是回到最原始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

问：你是否认为苏联和中共之间有可能爆发战争？

答：有此可能，但并非不可避免。如果毛泽东在目前的权力斗争中获胜，则中共与苏联的军事冲突将无可避免。在毛泽东的许多基本理想之中，有一项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那

就是他一心要据有俄国远东边区及西伯利亚的大幅土地，他甚至还梦想着要夺取俄国的土耳其斯坦。

毛泽东企图取代斯大林的地位，使自己成为世界革命的组织者。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就是决心要使共产小国成为世界革命的基地。但是毛泽东的才干与斯大林相差得太远了，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加强中国的地位，而且成为今天共产小国内部一切大混乱的根源。

问：在当今的苏联领袖之中，有谁的才华堪与斯大林相比？

答：你老兄请勿误会我景仰斯大林的才干。他是个极倔强的共产党徒，他对列宁的战略和政策的了解，比列宁左右的任何一个人更为透彻。而今天，当马克思列宁主义已在苏联蜕化变质之际，已不可能产生一个新的斯大林。

问：你认为“十月革命”的结果对今天的世界是产生了好处抑或坏处？我所谓的好处，是指五十年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虚妄而使世人致力于探索一种更好的理想社会。

答：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政变，不仅对于俄国而且对于全世界说来，都是一大悲剧。极权统治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不论是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国或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或者是今天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皆有连绵不绝的整肃和暴行、骇人听闻的杀戮和镇压。

共产主义带给世界的是仇恨、战争以及对人性的摧残。

历史已经证明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是错误的，所有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人民都像俄国人一样，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问：认识了这一点，又怎样呢？

答：这不是共产国家何去何从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问题。“福利国家”的新理想正在世界各处蓬勃发展着。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维护个人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在向“福利国家”之途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到怎样维护个人与社会、思想及政治独立性。

（本文一九六七年刊载于台湾《春秋》杂志）

决 战

——托洛斯基笔下的“十月革命”

在科尔尼洛夫向首都进军的日子，监狱势如千钧一发。人人都清楚，如科尔尼洛夫进了城，第一件事就是把克伦斯基逮捕的布尔什维克统统处决。除此以外，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担心在首都的自卫军分子袭击监狱。为了保卫“十字架”监狱，派来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它显然不是“民主党”的，而是布尔什维克的，并且随时准备释放我们。这个举动本来可作为立即起义的信号；但是现在时机还未到。同时，政府本身出于召唤布尔什维克水兵来保卫冬宫的同样原因，开始释放我们。从“十字架”监狱出来，我直接来到刚刚成立的保卫革命委员会。在这里出席会议的正是那些把我作为霍亨索伦王朝的特务关进监狱的老爷们。现在还没有撤销对我的指控。民粹党和孟什维克党徒，说句老实话，一看见他们的尊容就希望科尔尼洛夫能抓住他们的领口把他们甩上天去。但是这个想法不单是用心不良，而且也不策略。布尔什维克在防务上已经担起了主要的任务，到处都占着首要的位置。科尔尼洛夫暴动的经验补充了7月的经验。再一次发现克伦斯基及其一伙的身后没有任何独立的力量。那支奋起抗击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就是日后举行十月革命的部队。我们利用了这个危机来武装工人。他们正是那支先前采列捷利不遗余力地想要解除他们武装的工人队伍。

这些日子城里平静了下来。一些人怀着希望，另一些人担惊害怕地等待着科尔尼洛夫。孩子们听人说：“明天就可能到。”第二天早晨，还没有穿好衣服，他们就睁大了眼睛向窗外张望：来了没有？但是科尔尼洛夫没有来。群众的革命高潮如此强大，使科尔尼洛夫暴乱冰消瓦解。但这次兵变并非没有痕迹，而是全部变成了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因素。

我在科尔尼洛夫暴乱的日子里曾这么写过：“报应是不会太迟的。被驱逐、迫害、诽谤的我们的党，从来没有像最近这样迅速成长壮大。这个过程很快就从首都扩展到外省，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和军队中……我们的党时刻都是无产者的阶级组织。它必将在镇压之火中成为一切被压迫、受摧残、被欺骗、受荼毒的群众的真正领袖……”

我们勉强赶上了汹涌的潮流。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里，布尔什维克的人数日益增多。我们的人已达到半数，而主席团里还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这样就发生了改选苏维埃主席团的问题。我们向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人建议组成联合主席团。后来才知道，列宁对这个作法并不满意，他恐怕其中掩藏着调和主义的祸水。但是任何妥协也没有发生。采列捷利不顾不久以前共同抗击科尔尼洛夫的情谊，拒绝了组成联合主席团的建议。不过这正中我们的下怀，现在只能通过对手投票来解决问题了，我提出问题：在我们的对手的名单里是否应列入克伦斯基的名字？克伦斯基在形式上是主席团成员之一，但他从未到过苏维埃，并且千方百计地表现自己对它的蔑视。我提的问题使主席团措手不及非常狼狈。虽然大家都不喜欢，也不尊敬他，但又不便把总理排斥在外。主席团成员在一阵窃窃私语后答复说：“当然列入名单。”这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下面就是会议记录中的一个片断：“我们曾确信，克伦斯基不再是苏维埃的成员（暴风雨般的掌声）。但原来是我们错了。克伦斯基的影子在奇赫伊泽与扎瓦杰之间游荡。当建议你们赞成主席团的政治路线时，请记住，就是建议你们赞成克伦斯基的政策（暴风雨般的掌声）。”这又使其他一百多名摇摆不定的代表投向我们的一边。苏维埃的成员多达千余人。投票是走到门外进行的，大厅里气氛非常激动。因为此事不是关系到主席团，而是关系到革命。我同一些朋友在会场外散步，我们估计自己得的选票离半数只差百余票，并认为这就是胜利。结果却是：我们得票比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联盟还多出一百余票。我们成了胜利者，我当了主席。采列捷利在告别时，祝我们能在苏维埃哪怕能支撑他们领导革命的时间的一半也好。换句话说：我们的对手只想把权力交给我们顶多3个月。他们大错特错了。我们信心百倍地朝政权迈进。

……

革命的12点钟到了。斯莫尔尼宫变成了一座堡垒，它的顶楼上有20来挺机枪，是前执行委员会遗留下来的。斯莫尔尼宫的警卫队长格列科夫上尉是公开的敌人。为此，机枪队长专门来告诉我：机枪手们服从布尔什维克的指挥。我派了一个人（大概是马尔金）去检查机枪。发现机枪的机件失修，根本没有保养。机枪手一贯偷懒，正是因为不愿意保卫克伦斯基。我把一支可靠的机枪队调入斯莫尔尼宫，当时正是10月24日灰蒙蒙的清晨。我在楼上、楼下各层间走动；一方面是为了别老待一个地方不动，另一方面是需要检查一下是否一切妥当，鼓励需要鼓励的人。在斯莫尔尼宫那几条半明不暗走廊的石板地上，士兵们脚步咚咚地拖着隆隆作响的机关枪。这就是我新调来的机枪队。还留在斯莫尔尼宫里的少数社会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从门缝里探出睡意朦胧、惊惶万状的脸。这阵悦耳的声响不会预示什么好兆头。他们便一个接一个地匆匆溜出了斯莫尔尼宫。于是我们便成了整个建筑的主人。它将把自己布尔什维克的头高扬在城市和全国的上空。

清晨，我在楼梯口碰见了两位工人，一男一女，他们从党的印刷所跑来，累得气喘吁吁。政府封闭了党中央机关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报纸。政府派来的几个特务在士官生们的陪同下封闭了印刷所。乍一听到这个消息不由得产生一个印象，即形式的东西对人的头脑竟有如此之大的威力。“难道不能把封条撕下来吗？”女工问。“撕吧，”我回答说，“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给你们派一个警卫队。”“工兵营驻扎在我们附近，士兵肯定会支持我们的。”女工自信

地说。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即颁布命令：“1，革命报刊的印刷所必须启封；2，建议编辑部及排字工继续出版报刊；3，保卫革命印刷所，防御反革命骚乱的光荣任务赋予立陶宛团和第六预备工兵营的英勇士兵。”从此，印刷所的工作没有间断过，两份报纸继续照常出版。

24日在电话局遇到了困难，士官生盘踞在那里。在他们的保护下话务员开始反对苏维埃，不给我们接线。这还是第一起孤立出现的怠工事件。革命军事委员会派水兵部队前往电话局。他们在大门口安下两门小炮，电话便通了。管理机关的占领是这样开始的。

在斯莫尔尼宫的三楼拐角上的一间小房间里，委员会在不停地进行着会议。有关军队调动、士兵和工人的情绪、在军营里进行的宣传鼓动、大屠杀组织者的意图、资产阶级政客和外国大使馆的阴谋、冬宫的状况、前苏维埃各政党的会议等各方面的消息都集中到这里。来报告消息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工人、士兵、军官、看门人、社会主义者、仆人和小官吏的妻子等等。有许多人报上来的纯粹是无稽之谈，有些人却提供了重要而有价值的情报。我几乎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离开过斯莫尔尼宫，和衣在皮长沙发上过夜。我只能抽空睡一会儿，而且还经常被信使、侦察人员、自行车队士兵、电报员和不断的电话铃声唤醒。决战的时刻即将来临，很清楚，回头路是没有的。

24日夜晩，革命委员会成员们分赴各区。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稍晚一些时候来了加米涅夫。他是反对起义的，但愿意和我一起度过这决战之夜。于是我们俩就待在三楼拐角的小房间里。在这决战之夜，它很像船长的舰楼。隔壁一间大而空旷的房间是电话间。大事小事都往这里打电话。阵阵铃声更加强烈地衬托出警觉的寂静。很容易想象出当时彼得格勒的夜色：空旷的街道，灯光昏暗，秋季海风四处吹动，资产者和官吏阶层的人们蜷缩在被窝里，尽力猜想在那可疑而危险的街道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工人区则是紧张的战地野营。在沙皇宫殿里，各种委员会和各参政党在协商会议中累得精疲力尽，在这里，活的民主幽灵碰上了徘徊不去的君主政治之灵。大厅里绸缎和金碧辉煌的色彩时时因煤炭缺乏，而沉浸在黑暗之中。各区都有工人、水兵、士兵小分队在值勤，年轻的无产阶级战士斜挎着步枪和机枪的子弹带，街上纠察队在篝火旁取暖。在这个秋夜里首都就要从一个时代跨入另一个时代，它的精神生活就集中在这20多台电话机上。

从各个市区、各郊区和进首都的各个要道口来的消息都汇总在三楼的房间里。看来一切都已考虑周全、指挥人员各就其位，通信有保障。似乎没有遗漏什么了，在脑子里再检查一次。今晚是决战之夜。头一天，我在对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的报告中，确信不疑地说：“如果你们不动摇，内战就不会发生。我们的敌人将立即投降，你们也可以得到你们应得的位置。”对胜利决不能有丝毫怀疑。起义的胜利是有十分把握的。但是，这几个小时仍是提心吊胆、十分紧张。因为即将来临的夜晚将决定一切。

政府一方面动员士官生，一面下令“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驶出涅瓦河。命令是针对那些布尔什维克水兵的，也就是在8月间斯科别列夫恭敬地请求他们保卫冬宫免遭科尔尼洛夫攻击的那些水兵。海员们向革命军事委员会请示应该怎么办。“阿芙乐尔号”在那夜仍然屹立在前一夜抛锚的地方没有动。有人从帕甫洛夫斯克给我打来电话报告：政府从那里调动炮兵；从皇村调了一个突击营；从彼得戈夫抽调准尉学校。克伦斯基正把士官生、军官、妇女突击队员调进冬宫。我则派委员们在通往彼得格勒各要道口建立牢固的武装警戒线。派遣宣传员去对付政府调来的队伍。一切往来的联络都使用电话，完全可以被政府特务窃听。但是，它是不是还会监听我们的电话呢？“如果你们不能用宣传来阻止他们，就使用武器。你们要用生命来担保。”我再三重复了这句话。不过，我自己也还不完全相信自己命令的威力。革命过于轻信、宽宏大量、乐观和轻浮，它以武装力量威胁多于真正动武，它仍然希望用谈判来解决一切问题。当前，这样还可以行得通。聚集起来的敌对分子被它的热气一吹，就烟消云散了。还在24日，我曾颁布命令：一旦在街上发现破坏活动，立即动用武器无情惩罚。但敌人连想也不敢想上街，纷纷躲了起来。整个街道都在我们手里。在通往彼得格勒的各要道

口，我们的委员彻夜不眠。准尉学校和炮兵部队没有响应政府的号召，只有一部分奥拉宁包姆士官生趁着夜色越过了我们的警戒线。我通过电话监视着他们下一步的动向。最后，他们的行动以派人到斯莫尔尼宫谈判告终。临时政府寻找支援纯属徒劳，它的基础已经丧失殆尽。

新调来的机枪队加强了斯莫尔尼宫的外围警戒。我们与各卫戍部队的联络畅通无阻，各团内的值勤连彻夜不眠，委员们都各就各位。各战斗部队的代表都在斯莫尔尼宫听候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调遣，以防总部和各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络中断。各区的武装部队在街道行动，占领了一个又一个机关，有时按门铃，有时不按铃就直接把门打开。这些部队几乎到处都遇到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们的朋友。派往各车站的特派员们敏锐地监视着来往的火车、特别注意军事调动的情况。没有任何令人不安的消息。城里最重要的地方未经战斗和流血牺牲就都转入我们的手中，我们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电话里传来消息：“我们在这里。”

一切都好，好得不能再好了。现在我可以离开电话机了。我坐到长沙发上。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一阵疲倦感像波浪一样冲上头来。“给支烟吧！”我对加米涅夫说。在那些年里我还在吸烟，尽管吸得不多。我深深地吸了两口，刚刚在心里说：“就是缺这个，”就失去了知觉。当身体有病痛时发生昏厥的毛病是从母亲身上继承下来的。一位美国医生据此认为我患有癫痫病。醒来时，我看见加米涅夫俯身看着我，满脸惊慌。“是不是需要搞点什么药来？”他问。“最好能搞点吃的来，”我想了想回答说。我尽力思索最后一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但是想不起来，反正不是昨天吃的。

第二天早晨，我浏览了一下资产阶级和妥协派的报纸。报纸对已经开始的起义只字不提。它们只是连篇累牍、喋喋不休地叫喊什么武装士兵即将开赴前线、溃败、不可避免的流血牺牲以及一场政变等等，而对实际上已经发生的起义却视而不见。报界对我们同参谋部的谈判信以为真，把我们的外交声明当作是举棋不定。而在这时，我们的士兵、水兵、赤卫军各部队奉从斯莫尔尼宫贵族女子学院发出的命令，正在没有一点儿骚乱，没有冲突，几乎是不放一枪、不流一滴血的情况下占领了一个又一个机关。

清晨，当居民们揉着惊恐的眼睛醒来时，已是身在新政体之中了。难道布尔什维克真的夺取了政权？市杜马的代表团来拜见我，提了几个不可思议的问题：问我们是否准备出征，有多大规模，在什么时候？杜马有必要“在24小时之内”了解这些情况；苏维埃采取什么措施来保障安全和秩序？等等，等等。我没有正面回答，但对他们解说了辩证的革命观，并建议杜马通过一个代表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建议比起义本身更叫他们害怕。最后我像往常一样，本着武装防御的精神说：“如果政府用铁来对付我们，我们将用钢来回报”。

“你们会不会因为我们反对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而解散我们呢？”我回答说：现杜马反映昨天；如果发生冲突，我们将建议居民群众就政权问题重新选举杜马。代表团离开时，像来时一样糊涂。但却给我们留下了更加坚定的胜利信心，一夜之间，发生了某些根本的变化。3个星期以前我们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取得了多数。但那时我们只是一面旗帜，没有印刷所，没有经费和下设行政部门。就在这一夜里政府还做出了逮捕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的决议，搜集我们的住址。但现在杜马竟派代表来找“被追捕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探听自己的命运了。

政府依然盘踞在冬宫，但已经变成了自己的影子，在政治上它已经不存在了。冬宫从10月25日以来逐渐被我们部队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中午1点钟，我对彼得格勒苏维埃作当前的形势报告。对这个报告报纸上是这么报道的：“我代表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临时政府已经垮台（鼓掌）。有些部长已经被逮捕（欢呼声）。其余的也将在近几天或几小时内被逮捕（鼓掌）。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下的革命卫戍部队解散了临时议会（掌声雷动）。我们在这里彻夜不眠，通过电话了解革命士兵、工人近卫军如何悄然无声地完成着自己任务。市民安然入睡，不知道此时正在进行着政权的更迭。火车站、邮局、电话局、彼得格勒电讯社、国家银行都已占领（热烈鼓掌）。冬宫还没有占领，但它的命运将在这几分钟内决定（热烈鼓掌）。”

这样简单的报道会使人对会场的情况产生不正确的印象。在我的记忆中，当我谈到当夜政权的更替时，几秒钟之内大厅里鸦雀无声，此后，才鼓起掌来。但也不是暴风雨般的，而是有些迟疑的掌声。整个大厅都在感受着、期待着。当准备战斗时，工人阶级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热情澎湃。当我们一步跨过了政权的门槛，冲动的热情被警觉的思考所代替。正确的历史本能就表现在这里。要知道我们将面临着旧世界最疯狂的反抗、战争、饥寒交迫、破坏、流血和死亡。我们能战胜这一切吗？许多人这样问自己。因此产生了短暂的疑虑。我们能战胜！众口一词地回答。新的危险在远方闪现，而当前是伟大胜利的感受。它使我们血液沸腾，这种感受在为列宁而召开的热烈的欢迎会上宣泄出来。他在缺席几乎长达4个月之久后，初次出席了这里的会议。

深夜里，我们等待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我同列宁在会议厅旁边的一间小房间里休息。那儿空荡荡的，只有几张椅子，不知是谁给我们铺上了毯子。有人——大概是列宁的妹妹——给我们拿来了枕头。我们并排躺着。肉体与灵魂松弛下来，好像绷得过紧的弹簧一样。这是一次应该得到的休息。我们都睡不着，低声地交谈着。列宁到现在才完全谅解了起义的拖延，他的忧虑消除了。在他的语调里出现了不同寻常的真挚，他详细地询问了关于布置在各处的赤卫军、水兵和士兵混合组成的纠察队。“这是多么壮丽的画面啊！工人手执武器和士兵一同站在篝火旁边，”他深有感触地一再重复着，“士兵和工人终于结合起来了！”后来，他忽然想起：“那冬宫呢？到现在还没有拿下来？千万别出什么问题！”我欠起身来，想打电话了解战斗的进展。但列宁拦住了我：“您躺下吧。我马上委托个人去问。”但是，不能久躺。大厅里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了。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妹妹跑来找我说：“马尔托夫在发言。请您去呢。”马尔托夫声嘶力竭地谴责阴谋家，预言了起义将彻底失败，并要求我们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结成联盟。那些在昨天还站在当权者一边诽谤我们、搜捕我们的政党，竟在我们把它们推翻之后，又要求我们与之妥协。我答复马尔托夫，并通过他答复了昨天的革命：“既成事实是起义，而不是阴谋。人民群众的起义不需要辩解。我们锻炼了工人、士兵的革命毅力，我们公开锤炼了群众的起义意志。我们的起义胜利了。现在有人向我们建议：放弃胜利吧，签定协议吧。和谁？你们是破产者。你们的戏已经演完了。到你们今后应该去的地方：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吧！”这就是从4月3日列宁来到彼得格勒开始的长期对话的最后一段对白。

.....

那些日子不论在国家的生活中还是在个人生活中都是不平凡的日子。社会激情的应力和个人力量一样达到了极限。群众创造着时代，领导者们感到他们的步伐与历史的步伐交融在一起。在那些日子里所做出的决策、所颁布的命令都关系着整个历史时代中的人民的命运。这些决策几乎都不曾经过讨论。我不敢说它们是经过仔细斟酌和周密考虑的，它们都是即兴之作。但它们并未因此而变糟。事件的压力是这样强，而任务又是如此明确。最重要的决定轻而易举地迅速做出，好像是某种理所当然的东西，也是这样被领会的。道路是事先决定的，需要的只是叫出任务的名称，不需要论证，几乎也用不着号召。群众毫不犹豫、毫不怀疑地响应局势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在事件的重压下，“领袖们”说出的全是符合群众需要和历史要求的话。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是无意识历史过程的自觉的表现。但无意识——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一一过程只有在其最高峰上，即群众的自发反抗打破了社会陈规陋习的大门，使历史发展的深层要求胜利地表现出来时，才能与其自觉的表现合拍。此时，时代最高的理论意识和其最深远的根源——根本不懂理论的群众的直接行动融为一体。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的结合，就是那通常被称为灵感的東西。革命是历史最强的灵感。

每一位真正的作家都知道创作中有这样的时刻，似乎另外一个更有力的人在驱动着他手中的笔。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都经历过这样的瞬间，那时他的嘴里讲出比他在平时讲的更强

有力的语言。这就是“灵感”。它在充分发挥全部创造力量时产生。无意识从其深深的洞穴中升起，使自觉的思维工作服从自己，在一个高度的统一体中把后者和自己融为一体。

充分发挥精神力量的时刻，在一定的瞬间囊括了与群众运动相关的个人活动的所有方面。十月革命的日日夜夜对“领袖们”来说，就是这样的日子。机体内潜藏的力量，它的深刻的本能，从其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嗅觉，所有这一切都积极地活动起来，拆毁了心理陈规的大门，与最高的历史——哲学的概括一起为革命服务。这两个过程，个人的和群众的，都是以意识和无意识的结合，构成意志动力的本能和最高的概括思维的结合为基础的。

（本文选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年出版《我的生平——托洛斯基自传》）